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实藤惠秀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日〕实藤惠秀著

谭汝谦 林启彦译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宁成春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

中国人 日本留学史（増补版）

东京くるしお出版, 1970

译自日本东京くるしお出版社一九七〇年日文版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Zhongguoren Liuxue Riben Shi

〔日〕 实藤惠秀著

谭汝谦 林启彦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 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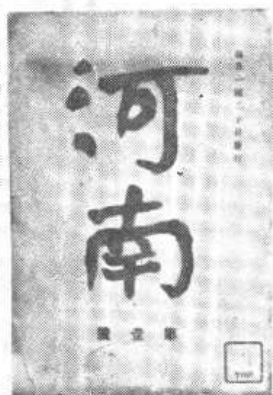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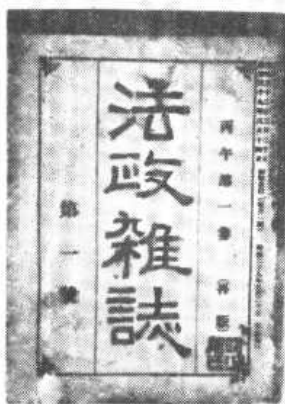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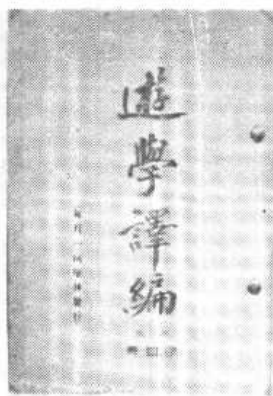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7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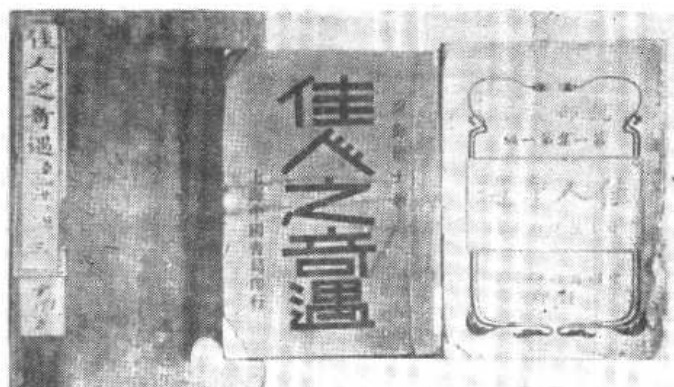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200

书号 11002·614 定价 1.90 元



前期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發行的雜誌



原本（左）譯本二種（右）《佳人之奇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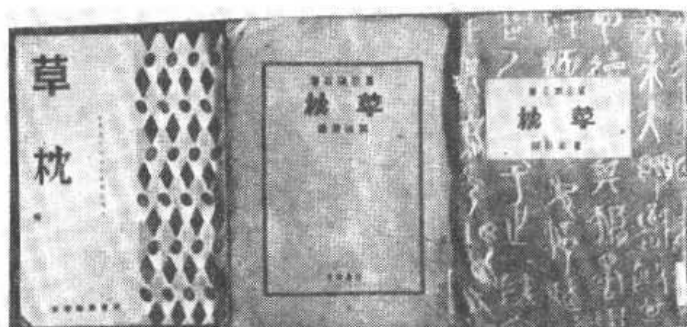


原本（左）譯本（右）《支那開化小史》



原本（左）譯本（右）《長廣舌》

日本書和它的中譯本



日本書和他的中譯本



後期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發行的雜誌

出 版 说 明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是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著作，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林启彦两先生曾将本书译出，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为便于国内研究者参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商请我们在国内出版发行。

本书引证博洽，资料甚多，可供我国研究者参考。著者热情赞扬中日友好，批评分析历史上影响两国人民友谊的各种因素，相信它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书中对某些历史问题、人物、事件的提法和理解，与国内研究者虽有不同，却无碍于本书著者的上述基本态度。

本书香港版未收“后记”一文；为使我国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著者的心情，在著者要求下，国内版将全文收入。“后记”是由曾丽卿同志译出的。

在本书出版工作中得到实藤惠秀、汪向荣、谭汝谦、林启彦几位先生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

一九八三年二月

译 序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势日蹙，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非大力培植人才，积极学取西洋近代文化，无以求存图强。故自 1872 年起，中国即派学生留学西洋。惜当时社会风气闭塞保守，国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以致留学一事不为社会所重，其成效亦甚微。惟自经洋务运动的无功与甲午战役的惨败，国人始猛然觉悟，日本维新之有成，端在善于学取西洋文化所致。故甲午之后，举国上下，莫不视游学东瀛为富强之要径。盖国人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竭力输入西洋文化，每能去芜存菁，取精用宏，因而相信若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可获事半功倍之效；且东游又有路近、费省、文同各种便利。职是之故，自清末以还，虽国内变乱频繁，中日邦交屡有起伏，而负笈东渡者，始终络绎于途。计自 1896 年首派留日学生起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全面停派止，四十二年间，国人留学日本者总数不下五万人，蔚成中国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而留日运动所造就的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大军，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均有相当深钜的影响。

然而，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富有历史意义而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尚乏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有关留日史的专门研究，亦甚少见。就调查所得，目前可见的专著似仅有以下几种：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1933 年）、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75 年）、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台北，1976 年），颖之《中国近代留

学简史》(上海,1979年)等。除黄氏之书比较清楚说明清末留日运动历史的发展外,其余诸书,所涉年代虽较长,范围亦算广,但都不免失于疏略,读者即使比合而观,亦难得见留日运动史全貌。

实藤惠秀教授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东京,1960年初版,1970年增订版)一书,出版年代虽比后三书为早,但至今仍为资料最丰富,论述范围最广,而所涉年代最完整的一部学术著作。国际学界对此书的评价,一向甚高。因此,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不但可弥补目前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还可启导国人开拓更广阔而深入的研究。

实藤先生《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使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留日学生的日记、书信、著译书刊、口述史料,以及中日文公私档案文牒等,详述1896年至1937年间留学日本运动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种类及课程,亦论及清末以来留日学界的种种政治组织和活动,又另立专章详细探讨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语言、翻译、出版事业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此书不但取材广博,立论亦颇平实客观,故面世以来,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研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叶中日文化关系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且被认为对开拓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深具启发作用。美国前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费正清博士曾称本书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盛赞实藤先生的研究乃“广泛而先驱性的拓荒工作”,洵为的论。

实藤先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自1928年起即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及其附属的学院,以迄1965年荣休。早稻田大学自清末以来即招收大量中国留日学生,设立“清国留学生部”,故与中国的留日史关系至为密切。实藤先生对中国留学生问题发生兴趣,与他长期所受教育和工作的环境很有关系。自二十年代起,先生即着手搜集清末以降有关中日文化关系的史料,并且立下宏愿,要撰

写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史书。经十多年辛勤的工作，获得数千种与留日学生有关的图书和资料（抗日战争后期，先生把该批贵重文献赠予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近年改名为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庋藏，使免遭战火，至六十年代经馆方整理后，专设“实藤文库”，供学者研究之用，迄今仍为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问题的宝库之一），先生即以这批资料为基础，于1939年写成《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由东京日华学会出版（非卖品）。战后，实藤先生重新改写《史稿》，经多次的增订改易，于1960年以《中国留日学生史之研究》一文，荣获日本国家颁授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1970年再出增订版。由此可见先生对此书写作之严谨和慎重。

增订版的《留日史》，不但扬弃了《史稿》中不少偏激和主观的论点，更把《史稿》中原占极大篇幅的留日运动发展史内容浓缩成为一章，又补充不少战后新见资料，另立章节探讨与留日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历史课题。该书经改写后，使读者对留日运动的历史及其时代意义有更明确的认识。新著显示实藤先生的匠心与造诣，均已超迈往昔。留日学生史的研究，的确可视为实藤先生毕生致力的学术事业。读者不难由本书的撰述经历，体会作者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及其对学术的诚挚态度。

此外，实藤先生又是研究中日关系史、中国近代语言文学和日本语言学的专家，其重要著作有：《明治时代中日文化的连系》（1943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略史》（1955年）、《为了日本语的纯正》（1956年）、《中国的文字改革》（1958年）、《近代中日交涉史话》（1973年）等；编译作品有：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与丰田穰合译，1942年）、老舍《四世同堂》（与铃木择郎等合译，1951至1952年）、王瑶《现代中国文学讲义》（与千田九一等合译，1955至1956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语文法讲话》（与北浦藤郎合译，1956年）、《大河

内文书——明治中日文化人的交游》(1964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与郑子瑜合编,1968年)、《中日非友好的历史》(1973年)、《近代日中文化交涉史话》(1973年)、《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1980年)、《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1981年),合共数十种之多。

《留日史》中译本据1970年的增订版译出。两位译者与著者虽然年差半百,但自1968年起即结忘年之交,且曾多次合作,研究《留日史》的翻译工作,因此经常获得原著者的鼓励和帮助。中译本直接引用的罕见中文文献,即多由原著者提供。在译文方面,译者经常通过书信向著者请益问难,必定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详尽答复。此外,原著者又同意译者订正原著若干漏误,删节过长的引文,更动原著若干章节和段落,务使中译本在外观上与内容上均可达致更佳的平衡。至于遣词用字方面,著者更鼓励译者大事藻饰。著者以上种种虚怀若谷的做法,使译者深为感动。译者复参考新近出版资料,重编留日史大事年表,补加译注和征引文献目录,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大方便。

本书的翻译,由开始动笔至定稿完成,荏苒已过十三载岁月。在这段悠长的日子中,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工作时辍时续。使本书未能早日与读者见面,我们惟有向原著者和读者表示最深的歉意。

我们衷心感谢日本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逊(Marius B. Jansen)教授先后大力荐介原著,使我们加深对原著的认识,从而促发翻译的动机和坚持翻译的决心。在翻译过程中,承蒙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教授、陈荆和教授、孙国栋教授、王尔敏先生、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黎明先生等师长经常不吝赐教,良深感纫。复承汪向荣先生、萧滋先生、余冠初先生、梁国豪先生、陈湛颐先生、周佳荣先生、李朝津先生、何炳坚先生、何镇中先生等,或润饰译文,或提示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我们还要特别

感谢我们的内子谭丽萍女士和林洁明女士，分别为我们的翻译工作分担了不少劳苦。

对于原著者实藤惠秀先生，我们不但衷心感谢他十多年来对本书翻译工作的指教和帮助，更要感谢他在半个世纪以来献身留日运动史和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战后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努力和成就。

译者识力有限，本书谬误之处，与上述诸位师友无关，概由译者负责。冀盼同道先进，不吝批评指正。

谭 汝 谦

林 启 彦

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于香港

中 译 本 序

拙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承中国青年学者谭汝谦、林启彦二先生译，得与中国读者见面，本人感到荣幸之至。译者索序于我，使我想起来一些书成后发生的事以及个人一段惭愧的心路历程，拟借此机会向读者坦述。

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国号问题”的末段，有如下的结语：

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已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

这是 1960 年的话，如今这一预言幸获证实了。

1949年10月以后，日本人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但却制造了一个新名词“中共”——这是日本新闻界用以称呼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国度的名称，含有又讨厌又轻蔑的意味。虽然，“中国”和“中共”两个称呼曾经同时并存过，但因日本国民之间，称“中国”的比例日见增加，因此报纸和电台，终于不得不放弃“中共”而采用“中国”的称呼，以下是各大报章改称“中国”的日期：

《读卖新闻》从 1962 年 9 月起，

《朝日新闻》从 1964 年 10 月起，

《每日新闻》从 1967 年 12 月起。

至于电台方面，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日本放送协会）亦自 1969 年 8 月 28 日起决定取消“中共”的称呼，一律改称“中国”。

这种改正国名称谓的做法，是日本国民督导新闻界而获致成功的。（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变化详情，笔者已另撰《对中国的称谓》一文，加以论述，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因此，现在我们翻开较新的辞书，“支那”一词的释义就变成：“しな〔支那〕，名词，中国之旧称。”

民国时代的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闭口“支那”的程度，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是由于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存有轻蔑之心，因而招致中国人对“支那”这个名称反感所致。留日学生一听此名，即如芒刺背，心中非常痛苦不安。笔者谨向已故留日学生在天之灵和现在仍健在的留日学生诸君郑重报告，时至今日，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语汇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了。

在本书之末，有篇“后记”，结束时我这样说：

在写这本书时，特别考虑到，除了让日本读者给予批评外，我也希望中国的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我自问做过一些有愧于心的事，对不起中国朋友，但深感重要的是诚心向中国人表示歉疚，于是写出这篇冗长的书后话。

这本书写成后不久，我以“日本学术界考察中国文字改革代表团”团员身份（团长为土岐善磨先生）访问中国。当时，我曾经把自己在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拿走的四十多册图书送还中国。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联同接受。当时，我全身冒出了冷汗。

我以为如此做，自己身上的污渍总算洗清了。但是从一次偶然机会，忽然又想起此事来，不禁愕然而惊、竦然而惧。这是我个人一件非常耻辱的事，但请容我把它说出来吧！

回顾昔日，当日本军侵占中国期间，日本知识分子往往以“研究”为理由，不须向中国政府申领入境签证，便可渡海昂然进入“敬

爱的中国”；而研究费用，实际上是曾经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日本政府从中国敲诈得来的“庚款”的一部分。

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夺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对这种行为，虽也表示愤慨，但仍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我当时曾以早日完成自己编纂中的《中国杂志创刊目录》的理由来自解。今日细思之下，这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

上述的事情，我在“后记”中都有所叙述。可是，在当时尚未理会到问题的实质。如今反省起来，才知道这是最羞耻不过的事。我当时虽没有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行为，但自己心中却已默认了这些行为了。这真是一个不能饶恕的念头。

我当时的想法是：整理好这批杂志，编一个总目录（这已成为事实了），其中完整的一批，当然是留在中国。其余剩下来的一部分，就希望带给东京的中国综合研究所，使能在日本保存下来。再剩下来的一批，就想放在早稻田大学。

这简直是无礼之至！这简直是强盗行为！

在战后的岁月，学生们都说我对中国一边倒，家人都以为我是个中国狂热者，我也相信自己是少数敬爱中国的日本人士之一。

如果是真正的敬爱中国，那么当自己的同胞亮出军刀，在中国土地上大肆暴虐的时候，自己又怎能到中国趁火打劫呢？作为一个敬爱中国的人，又怎么可以把中国的贵重杂志带返日本呢？在敬爱的友人家中，未得友人的许可，便借口说要研究其家传而把大量文献夺走，天地间哪有这样的道理！

唉！我自己当时的潜意识其实与“一般日本人”并无多大的差异。这都是明治以来蔑视中国的教育所造成的恶果。这些事，直到最近我才完全觉悟过来。我知道即使我合着双手，叩头向中国朋友拜歉再三，也不该被饶恕的。

最后，关于本书中译出版的经过，我想也值得向读者说一说。远在1960年，当本书初版的时候，有一位香港的中国读者来信请求我授权翻译本书，我当时提出了两个条件，要求他能做到：

1. 本书要在中国内地出版；
2. 脚注要全部译出。

这位先生后来没有回音，中译的事便搁置了下来。

1968年秋，谭汝谦先生来日本留学，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介绍他与我认识，我知道他当时很有诚意翻译本书，而且已经译出一些章节。1973、74年间，林启彦先生为研究留日学生问题，亦到日本搜集资料，我们因此有缘缔交，林先生亦向我表示了翻译此书之意。我对他们同样地提出上述两个条件，而他们均未置可否，想或被我难住了。1977、78年间，我忽然接到谭、林两先生来函表示计划合译本书，我才知道他们原来一直未有忘怀这件工作。并且，我还知道他俩虽是同道，且还在同一大学工作，而到合译计划决定之时，才彼此知道对方过去和我结交这段往事。我当时虽很高兴，但仍半信半疑，我想他们能不能做到十多年前我提出的条件呢？料不到两年之后，他们两位已把本书全部译出，而且还很细心地订正原书不少错误的地方，对附注的处理，可以说比原书做得更周到。起初，这个中译本只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中文大学出版社知道我的意愿，便与三联书店北京总店签订协议，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国国内版。

至此，我的两个愿望全部实现，看到本书能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我真有说不出的快乐。

实 藤 惠 秀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于

东京，时年八十四岁